

故宫国宝的播迁，像似一列长长的火车，翻山越岭，驰过平原，喷吐着蒸汽奔向远方。
这列从北京开出的文物火车，我深悉它终必驰返原点，而我也一定会再搭乘这班火车返回故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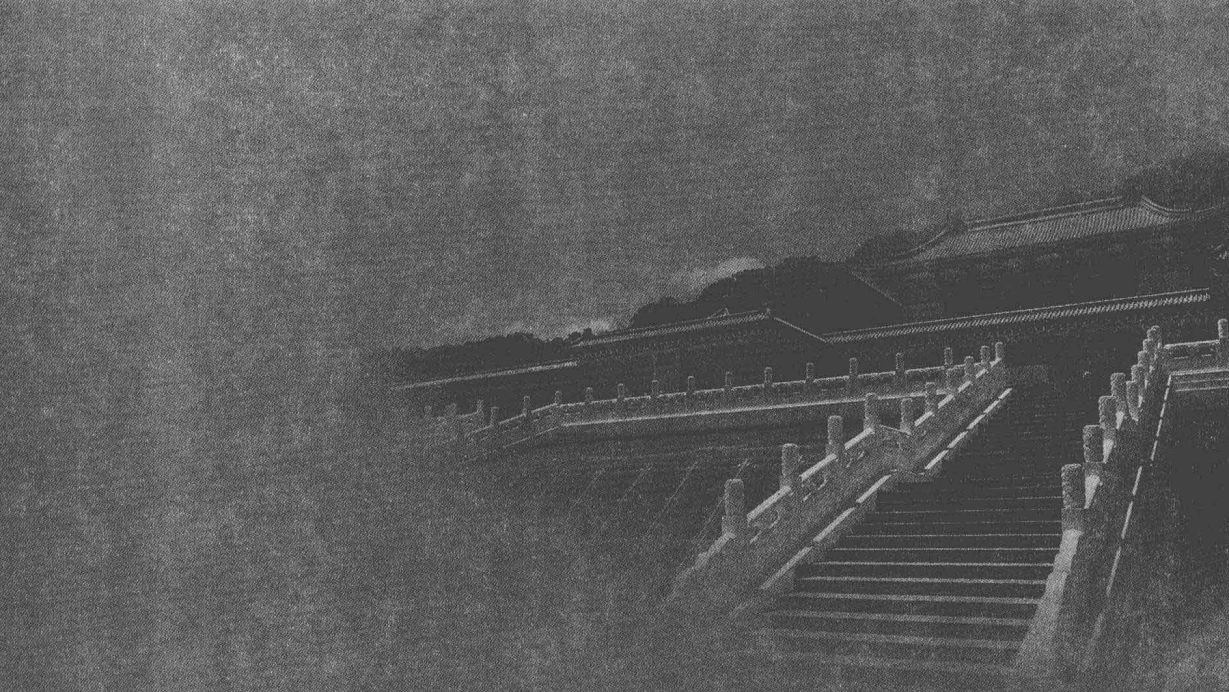
漂流的岁月

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栖迟天涯

庄因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漂流的岁月

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 · 栖迟天涯

庄因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流的岁月/(美)庄因著.—2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06-6064-5

I. ①漂… II. ①庄… III. ①庄因—自传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275号

著作权所有:©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百花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2-2010-19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16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楔子

001

我是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当时国民政府的“北平”)的。但是,四岁未足,就在卢沟桥第一声枪响,揭开了中国对日八年抗战序幕的那一年,便离别故乡,开始流浪了。卢沟桥的枪声,虽说并没有在我洁白如雪的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而那一声无情的、强词夺理的枪声,却实实在在侵略了我美好的童年,也击碎了我完整如梦的幸福岁时。像雪崩一般,迸散成了点点滴滴斑斑累累的冰花泪雨,汇入了丧乱的洪流。

战火,启明了一个大时代。同时,也把燃烧着罪恶的影子烙印在我一双单纯无邪的眼瞳上。炮声,炸裂声,呐喊声,军号声,马嘶声,哭号声,悲泣声,呻吟声……化作了血与泪凝结而成的音符,谱入了长江黄河,由澎湃咆哮的水浪奔放奏鸣,自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腹腔向四方滚泻——华北、华东、东南、华中、华南、西南……沉郁的时代悲怆命运交响曲,穿透耳膜,涌进了亿万人心田。从我有记忆以来,从不知自己曾享有太平儿童拍手嬉笑欢唱生命中许许多多亮丽美好事物的经验。我的童年是坚硬而贫瘠的。我没有初唱小猫小狗、小羊小马、小溪小花小草、燕子蝴蝶蜻蜓的快欣;没有初唱春风、星星、月亮、太阳、青山、碧野、大海的温馨光扬。平安、快乐、祥和岁月中的孩子们所感受到的明悦、可亲、晶丽、清爽又复温暖的一切,我都没有。跑进我童年意识中的是枪和炮、子弹和刺刀、黑暗与鲜血。战争,那我毫无概念也极其陌生的怪兽,把我吞噬了。

我永远永远记得,有生以来我第一首耳熟能详也习唱的歌曲,没有任何人正正式式教导我,而是听闻一人唱、十人唱、百人千人万人唱之后,无师自通琅琅上口的《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歌声流泻,越过长白山,俯过中原,跨过奔腾的黄河,展向愠怒的长江。无需任何人教授,只要有一个热血填膺的胸膛,就一定可以接纳得下,也一定会认同,因为那是大时代民族命运的悲歌。于是,你就会自然而然,欣欣首肯,随之引吭高歌了。这样的经历,如今想来,很难分辨言说是幸与不幸了。我那时,一个知识方萌、对于生活的感受犹是愚呆,对善与恶最基本的概念尚未成型的孩子,在从未经理性过滤及平衡的生活环境里,竟茫然接受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浓烈激扬的感情输血。这一个事实,让我惶惑,让

我紧张,也让我不知其所以然地感动。一半自发一半被动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时代命运。我就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中长大了。那歌声,有时像夏天的狂风、霹雷和暴雨;有时像旷野秋声;有时像寒月下的裂岸惊涛;有时像暗夜里迢递的海潮。一遍又一遍地,不停推扫,把我推入了庞杂、苦难的流亡人潮之中。我就像浪头的水花一般,不断向前洒落。当更多人血流成河,当更多同胞妻离子散,当更多人家园化为灰烬,当更多人尸骨堆成巨山的时候,我在逃亡。我在流浪。

逃亡。流浪。这都毋庸辩说。我想申说的是,我是如何掺入了这逃亡流浪的人潮中的。我想知道的是,正如《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中唱出的:“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

002

我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我是全然被动地随家逃亡流浪的。我不是有意识地自发地逃亡流浪的。“被动”及“自发”之间有着颇大的差距,前者的悲剧性远胜于后者。因为,这已属于无可奈何的了。一九三七年,当时父亲任职于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奉政府命令押运国宝疏散后方。他也是“被动”地负责国宝的安全,艰困辗转数省,最后才在抗战期中于贵州停驻下来,长达五年。在战前,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艺术精品,分别置放在八十只订制的黑铁皮大箱中,运至英国伦敦展览。父亲便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而故宫国宝在抗战时期的南迁工作,仍以那八十只黑皮大铁箱中的藏品为主,由原先负责押运出国的人——父亲,再度膺命护运。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到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存放贵州省安顺县,一九四四年底迁到四川省南部巴县,一九四六年自巴县再迁至四川重庆市,一九四七年随同故宫在抗战期间存放四川省峨眉及乐山两地的其他文物,一并迁回南京市。国宝文物历经沧桑,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原南京分院坚固的库房中。但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国共齟齬加剧,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年底迁运台湾。

我,就是在这一段不停迁徙的时序——自中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的炮火历练中长大。从一个愚呆的孩童到失乡的少年。再漂流到台湾,于十数年“天涯静处无争战”孤寂的日子里,蜕变为一个志在四海的中年,而终于在一九六四年离家去国,长期栖迟域外。故宫国宝的播迁,像似一列长长的火车,翻山越岭,驰过平原,跨江河,冲山洞,喷吐着蒸气奔向远方。国宝给了我得以亲炙、崇钦、吸收瑰丽中华文物艺术精粹的良机。它点化了我,赋予了我如何安身养生立命长志的认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契机上去宏发我对人类文化的关怀。离台以后,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政治上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在文化的感情和认知上,我是一个十足道道地地的中国文化人。这列从北京开出的文物火车,我深悉它终必驰返原点,而我也一定会再搭乘这班火车返回故国。

一九四八年年底,我到了台湾。我在抵台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上这么写道:

当年逃难,千逃万逃终未逃出中国。而这次居然“出国”了。台湾,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呀?它真的没有出现在我读过的地理课本上。历史课本上提到台湾是

割让给日本了。我虽然也知晓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归中国的领土,但我这次到台湾不可避免地有“出国”的感受。

日记上的记录,是一个身经巨变后的少年真真实实的感受。如今,我在海外异乡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这才是真正的“出国”呀!而这样的出国,全然出于一己决定。一个失乡之人在历史上竟然萌生“假出国”的意念来,委实是沉痛的。但不管是假出国还是真出国,从被动到主动,我的名姓未曾更改,我强烈的中国意识未曾动摇,我的生活习惯未变,我的发肤颜色始终如一,我的中国文化优越感也从未减退分毫……可是,这么长久以来我却未能在我心中潜在的中国度过,说起来是何等无奈、何等遗憾和何等怅惘的事啊!从自幼背井离乡的一个孩子,到皓首天涯的一个古稀老人,我心中的一个中国始终没有浮现,当然是极大的隐痛。我的大学同学、朋友,像陈若曦,像刘大任,他们曾经回归“中国”,却又失望地离开了。他们(也包括我)只能在非中国的土地上和政治环境中做一个实足的“文化中国人”,如此而已。

这样的心目中的文化的中国,也许就是数以千百万散居世界各角落的中国人的中国情结吧!“爱中国”,由于各人涉入程度的不尽相同,其所表现之方式亦殊异。拿我自己来说,我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受完整的中国教育于中国,是一个十足的中国文化培育出来的中国人。可是,我已然非落实于中国的土地上了。我的大学同学兼朋友的知名小说家白先勇说:

我来美国二十多年了,但我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要不是国家分裂,我怎么会留在美国,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我一定是在上海或南京。国家搞好了,不但现在的留学生会回去,我们这些人也都会回去。我爱中国,我爱的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暂时不能统一,但在文化上却是可以先统一的。在我国历史上,隋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国家虽然四分五裂,但文化上是统一的。各自都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起来。我虽然身在海外,但几乎每一天都注意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由于我的家庭和父亲的教育,使我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

白先勇曾经这么恳切却也无比痛心地说过。我也一样,因为我也是一个像他那样的国家主义者。我的家庭背景再加上父亲的教育,使我成长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不仅如此,我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国家主义者”,因为故宫传统文物国宝长久以来所给予我的熏陶。我不但认为,而且更其坚信,那列曾载着我发自北京的文化火车,驰骋万里把我送到海天一隅,那么,我终究会再乘它回到我的故乡去的。哪有永不回头的火车呢?这列火车,或许是暂时脱轨了,但是故宫国宝就是弥足珍贵的动力燃料,一旦生烧起来,我就

会在两地正式接上了轨的一天乘着它在光天朗朗之下冲回中国去，到达北京的。

这份信念，不仅感性，更其是相当理性的。感性的信念是虚浮的，而理性的信念则是扎实且稳妥的。我的岳母林海音女士生前，曾经在她《两地》散文集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

两地是指台湾和北平。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长大的地方。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地方。读书、做事、结婚都在那儿。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可以重返神州，喷气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

《两地》一书的序言，是作者一九六六年在台湾的台北写的，距今几乎是半个世纪了。斯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没有有限度的破冰解冻。所谓“两岸三通”的设想也仅止于构想。然则，半世纪后的今天，“两岸三通”已经由“构想”变成现实。虽则两地尚未正式地连接起来，喷气机自香港绕上一个弯已可以朝发而夕至了。拿我目前的境况与心情和当年岳母的境况与心情来比较，我已经不似她自己描写成的“苦人儿”了。我想到中国去，到北京去，只需买一张喷气机票，拔腿就成行了，而无需再“心悬”了。细说起来，我与岳母的情况有下列的异同之处：

一、“两地”是指台湾和北京，我们完全一样。其所异者是，台湾是她的故乡，而北京是我的故乡。

二、她在北平长大，而我则在台湾长大。

三、她在北平住了四分之一世纪，读书、做事、结婚都在那儿。我在北京却仅只住了四年，离开时一无所知。而且读书、做事和结婚全都不在那儿。

四、她当年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台湾是什么样子；而我当年在台湾的时候，却是常常幻想北京是个什么样子。

五、她当年不知道北平变了多少了，我也不知道。但我在一九八一年，虽乘飞机起自一个第三地方——美国，我是以“华人”的身份而“受邀”访问中国，回到了故乡北京的。所以，我比她幸运。因为，她当年连“华侨”或“华人”的身份也没有。

六、岳母已经过世，她盼望有朝一日游子还乡的愿景永远没有亲自看见它实现的一天了。而我是活人，她当年的希望，对我而言，很有实现可能的一天。而我也在内心强烈地感受着那希望的迫切感。



1999年，庄因和弟弟及家人重返贵州、四川、南京等地，寻觅儿时记忆和制作关于故宫文物南迁实况之“重返历史现场”节目时，偕子庄诚摄于武汉湖北省博物馆正门口。（庄灵摄）

总而言之，我已经在美国长住了四十年，远远超出了岳母当年在北平长住了的“四分之一世纪”。她的“两地”，于我已经扩增为“三地”了。最重要的，是不必再似她当年“心悬两地”了。最近的台海之间两地关系的发展，强烈地给了我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岳母当年“希望”两地连成一地的希望，其实现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是此，我的希望——自美国乘坐喷气机先回台湾，再直飞北京，已无需自香港乘坐火车驰往北都，已经变成随时成真的可能性了。

我在前面已经言说，之所以有这样一份强而浓烈的信念，都与父亲自幼给予我的教育（身教而非言教）有关。更与故宫文物长年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每思及此，侯德健先生的那首《龙的传人》的歌曲，便会在耳畔心上泛起。每一个音符，每一词句，都跟乐圣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一样，重重地敲击我的魂灵：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006

我见过长江美，有生以来已前后三次沿江而下；我也听过黄河壮，因为抗战时幼小的我就唱过《黄河大合唱》，及长更聆听过此曲无数遍。我于一九八一年访问中国，在西安，也到了黄河边上。没有下水，但在河边汲水洗手，让河水浸透皮肤，直串灌胸臆内的热血。一刹那，我感觉到自己的千古万年黄河儿女激荡澎湃情怀，因此，长江和黄河澎湃汹涌不是在梦里。我虽然不是完完全全在巨龙脚下成长，但我从来就认为我是一个龙的传人。我的儿子虽说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是一个政治上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可是他也一直认为他是中国人。而他的妻子李康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所以，我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龙的传人了。

二〇〇六年六月

楔子 / 001

001

上篇 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

第一部分 父亲、故宫、流迁 / 003

第二部分 在高原之巅 / 015

第三部分 飞仙岩下，向家坡上 / 032

第四部分 愁在莫愁边 / 046

第五部分 不容明月沉天去 / 055

下篇 栖迟天涯

第六部分 去国 / 083

第七部分 南往 / 087

- 第八部分 北来——初抵美国 / 095
- 第九部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 110
- 第十部分 哀伤的八十年代 / 149
- 第十一部分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 / 171
- 第十二部分 二十一新世纪 / 177
- 第十三部分 酒蟹居中酒中仙 / 190
- 第十四部分 庄门兄弟 / 214
- 第十五部分 卧虎藏龙 / 229
- 第十六部分 短钉杂碎 / 246



上
篇

故宫国宝南迁
与我的成长

第一部分

父亲、故宫、流迁

父亲和故宫国宝的一生情缘

父亲名严，字尚严，号慕陵，晚年自称“六一翁”。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六月八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未满周岁，遭逢义和团运动，襁褓中随家四处逃亡。次年，东北乱事起，二岁稚龄即随家经山海关落难暂居北京。次年（一九〇一年）生母朱禧珍女士病逝北京，遂与家人归返吉林。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一年）自吉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一九一七年十九岁，径赴北京报考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二〇年正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受教于胡适、马衡、沈尹默及沈兼士诸教授。一九二四年二十六岁，自北京大学毕业。旋经沈兼士教授大力推荐，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助教，并兼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是年十一月，清废帝宣统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接管整个故宫，负责清点宫内文物。自该时起，父亲即奉政府派令参与清点清宫文物工作。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父亲以二十七岁英年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位成员。

在这二十几个中国近代乱世的年头中，父亲处身于相当不凡的不平静中：自义和团运动出关入关；八国联军；清亡民国建立改朝换代；袁世凯改元称帝；五四文化运动；北伐以及一九二八年他以第一届北大与日本东京帝大互派留学生前往日本求学两年。大体上可说是身不由己的一再迁徙，仿佛注定了他终其一生的



192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初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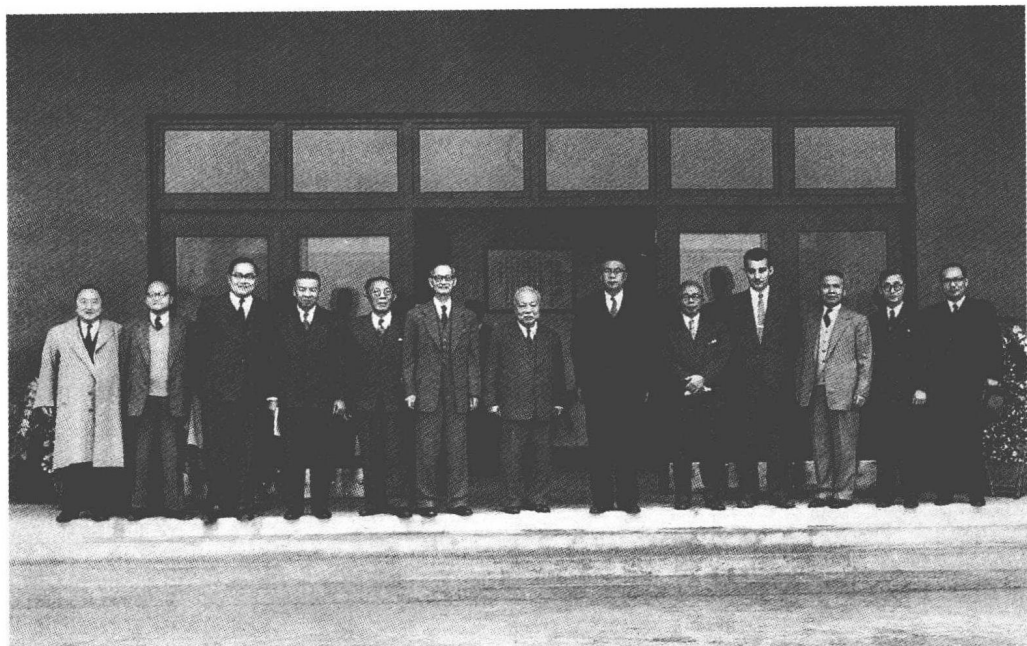
播迁漂荡。

004

一九三〇年父亲自日留学返国,即应母校北大国学门研究所考古组约聘,参加“燕下都考古团”在河北易县举行的文物发掘工作。一九三二年,为了因应国家在政治及军事上的局势,故宫博物院决定有系统地将院藏文物分批移运南方。次年,父亲升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故宫所藏图书、文献、古物分成五批先后运抵南京及上海。一九三五年,父亲奉政府派令押运故宫文物精品赴英国伦敦展览。次年,故宫博物院在南京兴建之南京分院竣工,故宫暂存上海之文物与赴英展出之文物悉数存放南京分院,而翌年父亲经院方调派任职于南京分院。同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为了故宫文物免于战火,存放南京曾赴英伦敦展出之文物精品经水路及陆路辗转转移运至贵州省,最后存放于安顺县。这一路长途跋涉,都由父亲总负其责。一九四四年冬,日军扑攻贵州,存放于安顺之故宫文物紧急疏散迁运四川,存放于川南巴县之一品场。一九四六年,抗日胜利后次年,文物又迁重庆市南岸海棠溪之向家坡。一九四七年,文物由船运沿长江东下至南京,存放于战前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旧址。一九四八年年底,国共齟齬转剧,存放南京分院之文物首批由父亲膺命乘军舰迁运台湾。抵台后,文物先存放新竹县杨梅(杨梅当年是在新竹县,桃园县是后来自新竹县分出来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及二月,原存南京分院故宫文物第二批及第三批运至台湾。三批运台故宫文物,计古物一千三百八十九箱,图书一千一百九十八箱,文献二百零四箱。至此,故宫运台文物经汇集于台中市,贮放在台中糖厂仓库中。同年七月,“国立故宫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由“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四个辖属单位联合组成)成立。次年(一九五〇年)，“联管处”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村新建之库房竣工,于是迁台之原故宫文物悉数存放于完工之山边库房及后方山洞中,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

一九五五年,父亲年五十七岁,升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同年,“联管处”之“中央图书馆”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两单位先后独立复馆复厂,“联管处”于是易名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一九五七年,“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在雾峰乡北沟村新建之文物陈列室落成,至此,自一九三二年从北京南迁之故宫文物,在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后,终于正式对外开放,供世人欣赏瞻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政府在台北士林依山建筑之大型新故宫博物院落成,原“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撤销,故宫及两博物院迁台之文物合并,存放新馆,新馆定名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几经播迁,历经战乱的故宫国宝文物,有了安身的新家,以独领世界古文物艺术之最高收藏风骚展现了绝代无双的风华。

父亲于一九六四年升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至一九六九年退休。他奉献了毕生心血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自北京历经战火丧乱,跋涉去台,总算有了安定的栖身之所,恢复了昔日雍华。对公对己,他都可以被认为是鞠躬尽瘁,抒怀展志了。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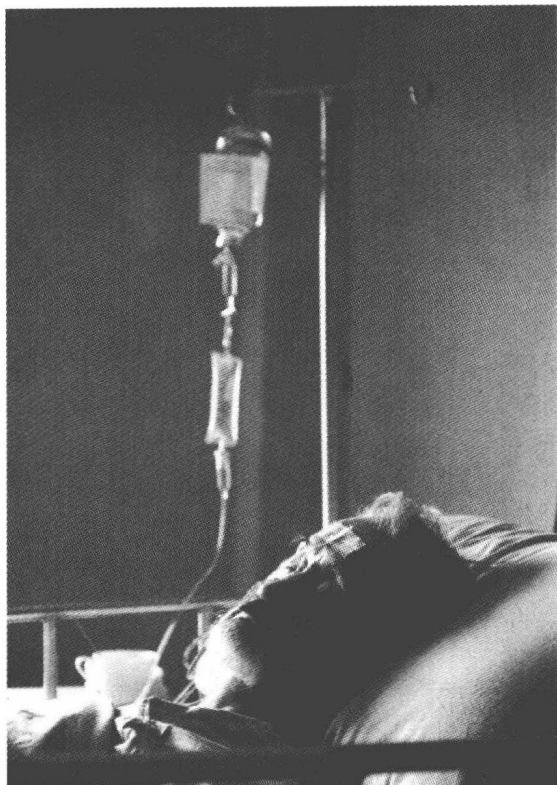
北沟陈列馆落成。左起(一至三):黄季陆、蒋复璁、孔德成、罗家伦(五)、梅贻琦(六),中为王云五。右起(一至三):包遵彭、庄严、陈启天、王世杰(五)、张其昀(六)。

一九八〇年,父亲以八十二高龄病逝台湾台北。

生前以“守藏吏”表述其对于故宫文物之保管、发扬(一次负责文物赴英伦展览,一次赴美五大城展出)、搬迁、研究及各方面职责之忠恪的父亲,真是与故宫国宝文物建立了一生情缘。而相对的,我也想说是故宫文物把他熏染陶铸,成了一个仙风道骨、适性知情、无宠不惊、随遇而安的现代中国文士。就在他过世的前一年,父亲在病中自书了“白须一把,赤血满腔”八字,似乎正说明了他对故宫文物的忠恪情缘之不渝。这也展现了父亲非凡的生命理想。

我的父亲庄严

虽然父亲生于东北,但是,他的大学求学时期是在北京。结婚于斯,成家于斯,立业于斯。北京是中国的历史人文之都,故宫可谓都中之都。故宫博物院所拥有的贵国国宝,是全中国世界级的文化精粹。在数亿中国人口中可以朝夕吮吸文化灵养的极少数人中,父亲是一个幸运个体。而在他往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随着国宝流迁,国宝也陪伴着他。为人子的我就在他与故宫文物这种互动中成长。我,毫无疑问是



1979年秋，庄严先生因肠疾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翌年3月12日病逝，享年82岁。（庄灵摄）

一个见证人，同时也是一个优质中国文化的受益人。

按照出生籍贯，说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北方人，是没错的。但是，在中国人溯源寻根的习性上及在逻辑上追探，他又应该是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的南方人。说他是北人南相，似不为过。一九八七年吴祖光乡兄访美过“酒蟹居”，我向他称道此事，他笑说：“这完全合情合理。武进的吴氏族谱中明载，吴庄两家曾有联婚。”而祖光兄的尊翁与父亲当年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共事，也曾明确证实父亲乃是常州庄氏家族之后。我之所以道出此点，意在说明似乎冥冥之中，父亲的家世背景已命定了他终生系列的漂流生涯。除了他童少期关内关外的流徙播迁；及长，赴日留学；一九三五年大学毕业后，经政府特派押运故宫文物赴英伦展出；抗战期间负责护送文物逃

难安迁；一九四八年故宫文物转移台湾后的数度易地迁搬；一九六一年赴美督导安排故宫文物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及旧金山五大城展出；一九六二年随台湾“书法访问团”赴日本访问促进文化交流；一九六六年又以台湾“书法学会访问团”团长之名义赴韩国访问。这一连串的文化流动，不但直接间接与故宫有关，他也似抚动了中国艺术的琴弦，将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与光彩音韵无远弗届传播四海。古城北京的北京大学的自由澎湃教育，启迪了少壮期的父亲，精致的中国文化抚育了他的一生。而时代，故宫的长期服务，播迁，再给予了他机缘增添了无限浪漫品味，成就了父亲身为珍贵中国文化鲜活化身的尊荣。一九八八年，在台湾出版的优质文化杂志《天下》月刊，精选介绍了自清代以来对台湾社会与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的二百位名人，父亲名列其中，可说是当之无愧。

我不能说父亲是一位伟人。但是，我肯定他一生因浸染于中国艺术文化的无尽